



唐代移都就食现象研究

丁海斌 国婷婷

摘要:移都就食是“主辅摇摆”现象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历史上的移都就食现象以唐代最为典型。唐代发生过至少十余次从长安到洛阳的移都就食。隋唐长安辉煌之下隐藏着不足:土地承载力已处于过度饱和状态。再加上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关中地区的经济地位大不如前,粮食远不能满足京师人口的需要。而且唐朝前期的漕运体系尚不健全,转运江南地区的粮食到长安远比到洛阳困难得多。于是,帝王便带领后妃及官员等去东都就食。就食期间,相应的政治中心也由长安转移到洛阳。直到开元以后,漕运问题得到良好解决,洛阳城逐渐衰落,帝王一行人才不再东去就食。唐朝前期,就食是帝王去往东都的根本原因,因此就食问题是研究唐代“主辅摇摆”期问题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唐代;长安;洛阳;主辅摇摆;移都就食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6-0078-08

纵观中国古代史,陪都制度是存在于多数朝代的一种政治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稳定统治、实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都城和陪都相互之间会发生角色的转换,笔者称之为“主辅摇摆”现象。历史上最为典型、最为频繁的“主辅摇摆”是唐代长安和洛阳之间的“主辅摇摆”,而唐代长安和洛阳的政治角色之所以能够如此频繁地转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在长安的唐朝朝廷和众臣屡到洛阳就食,即移都就食。目前,学术界对于唐代移都就食的专门性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本文首次对唐代移都就食的内涵、次数、原因等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一、唐代移都就食概况

中国历史上移民就食的做法并不鲜见。当某一地区发生饥荒后,在粮食运输比较困难的

特殊历史条件下,政府往往组织灾民向未遭灾、有储粮的地区逃荒,或者向地广人稀之处移民,这是我国古代较常见的一种救灾办法。如《汉书·武帝纪》记载:“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1]158}《资治通鉴·汉纪十一》载:“山东大水,民多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廩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2]635-636}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3]1437}。

移都就食是移民就食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百姓移民就食,可视为正常现象,而整个朝廷迁都就食,则是一件罕见的大事。它不是普通的

收稿日期:2021-05-30

作者简介:丁海斌,男,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南宁 530006),主要从事档案学、中国古代陪都、科技与社会等方面研究。国婷婷,女,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辽宁沈阳 110036)。

移民就食,而是“迁都”就食,其政治影响之大、各项事宜牵扯之广,显然非比寻常。

移都就食这一历史现象并非始于唐代,早在东汉时期,汉献帝迁都许都,直接原因也是为了就食,而唐朝前期的移都就食在历史上影响最大,也最为典型。

隋唐时期,中国历史的政治大势正处于东西走向的末期,即将向南北走向转换。长安(大兴)走向了它辉煌的历史高峰,但同时也是即将走向没落之时。因其辉煌,所以人口众多,靡费粮食甚巨,导致供应不足,辉煌也因此难以持续。

移都就食之时,皇帝及众臣一旦离开京师,到达东都,相应的政治中心也由长安转移到了洛阳,洛阳就由陪都成为实际上的都城,而长安则成为陪都;当皇帝一行人在东都就食渡过难关,关中地区经济好转后,再返回长安,这时长安又恢复为首都,洛阳也恢复为陪都,这就是唐代因移都就食形成的长安和洛阳间“主辅摇摆”。据笔者统计,唐前期(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唐廷东去洛阳就食共约十五次(除了三次大规模的主辅陪都互换之外)。其中,有明确记载以“就食”为由移都洛阳的,也有未明确记载“就食”但与灾荒有关的。

入唐之后,“贞观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老扶幼,来往数年,卒无一户亡去”^{[4]3878}。太宗时期遇到饥荒,鼓励百姓到其他地方就食,但是由于当时官僚机构还不是很庞杂,京师地区人口密度还不算太大,移都就食便显得没有那么迫切,三次到东都都没有明确以“就食”为由,但是这些临时移都明显分担了关中地区相当大一部分经济压力。武则天执政期间,长期移居东都,并“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5]122}。高宗七次就食于洛阳,从显庆二年(657年)第一次就食于东都至弘道元年(683年)卒于洛阳,二十六年半的时间里,驻洛时间占到二分之一。玄宗五次就食于东都(见表1)。高宗和玄宗都明确提出关中饥迫要就食于洛阳。

皇帝带领后妃、官员等东去洛阳就食,最后一次是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到二十四年(736年),之后,有唐一代再未到东都就食。这不单

单是安史之乱后,洛阳遭到破坏,主要是漕运系统的完善,帝王不用再逐粮而居。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裴耀卿提出了改善漕运问题的系统措施:“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三门之东,置一仓。三门既水险,即于河岸开山,车运十数里。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至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自太原仓溯河,更无停留,所省巨万。”^{[5]2115}玄宗对裴耀卿提出的分段水陆短途运输粮食的建议大加赞赏,于是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西柏崖仓、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开三门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关中”^{[5]2115}。这样,江淮一带的粮食先运到河阴仓,再转至含嘉仓,最后经太原仓运往长安。“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5]2116}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韦坚“治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是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4]1367}。这样,从运河运到黄河,再从黄河运到渭河河口永丰仓的物资,便可直接由永丰仓经过这道漕渠运到长安城下,不需要再用牛车运往长安了,进一步改善了从华阴永丰仓到长安一带的运输方法。大历四年(769年),又修建汴口仓。自此,一个完善的粮食转运系统建立起来:“由扬州开始,浮于江淮,达于汴水,入于黄河,转于渭水,分断仓储,节级转运,在千里运输线上,江河联接,仓纳路转,秩序井然。”^[6]

二、移都就食的具体原因

(一)长安:天府之国的难以承受之重

长安的政治军事优势是历代统治者将其作为都城的主要原因。“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7]142}唐王朝前期

	皇帝	时间	随行人员	与“就食”的关系
1	唐太宗	贞观十一年二月到十二年二月(约一年)	皇室诸亲、文武官员、侍从	间接“就食”:以祭祀汉文帝为由
2		贞观十五年正月到十一月(约十个月)	皇室诸亲、文武官员、侍从	间接“就食”:以泰山封禅祭祀为由
3		贞观十八年十月到二十年三月(约一年零五个月)	皇室诸亲、文武官员及招募的将士、侍从	间接“就食”:以征伐高丽为由
4	唐高宗	显庆二年正月到三年二月(约一年零一个月)	武后及皇室诸亲、官僚大臣及侍从	直接表明“就食”
5		显庆四年闰十月到龙朔二年三月(约两年零五个月)	武后及皇室诸亲、官僚大臣及侍从	主要由战事引发“就食”
6		麟德二年正月到乾封元年正月(约一年)	武后及皇室诸亲、官僚大臣及侍从	直接表明“就食”
7		咸亨二年正月到三年十月(约一年零九个月)	武后及皇室诸亲、诸大臣及侍从	直接表明“就食”
8		上元元年十一月到三年闰三月(约一年零四个月)	武后及皇室诸亲、官僚大臣及侍从	灾荒引发“就食”
9		仪凤四年正月到永隆元年十月(约一年零九个月)	武后及皇室诸亲、官僚大臣及侍从	直接表明“就食”
10		永淳元年四月到弘道元年十二月(约一年零八个月)	武后及皇室诸亲、官僚大臣及侍从	直接表明“就食”
11	唐玄宗	开元五年正月到六年十月(约一年零九个月)	皇室诸亲、官僚人员、侍从	直接表明“就食”
12		开元十年正月到十一年三月(约五个月)	皇室诸亲、官僚人员、侍从	直接表明“就食”
13		开元十二年十一月到十五年九月(约两年零十个月)	皇室诸亲、官僚人员、侍从	灾荒引发“就食”
14		开元十九年十月到二十年十二月(约一年零两个月)	皇室诸亲、官僚人员、侍从	灾荒引发“就食”
15		开元二十二年正月到二十四年十月(约两年零九个月)	皇太子等皇室诸亲、官僚人员、侍从	灾荒引发“就食”

表1 东巡就食录

的主要军事力量也集中在此。“唐代全国折冲府五百六十六(最多时六百三十四),而关中折冲府二百七十三,陇右折冲府二十九,河东折冲府一百四十一,三处合算起来,共四百四十三,占全国折冲府总数的四分之三强。”^{[8]55}所以定都长安是统治者稳定统治的不二选择。

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长安地区的经济劣势日益凸显,“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4]1365}。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盖关中之地农产物虽号丰饶,其实不能充分供给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需,而其地水陆交通不甚便利,运转米谷亦颇困难,故自隋唐以降,关

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还长安。”^{[9]162}

1. 京师粮食需求量增加

第一,长安的人口数量。唐代长安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各类消费型人口聚集,仅8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长安城内居民三十余万户,一户以五口计算,达一百五六十万人,加上宫内宫娥和宦官,上番的宿卫士兵,候选的官吏,流寓的外国学生等等,大概在一百七八十万人左右。居民有唐王朝境内各族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8]772-773}。这一数据有夸大之嫌,而学术界较流行的说法为百万之数。《长安志》中记载:“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10]240}这一记载比较可信,所以长安和万年两县至少应该有户8万,每户以6口计算,长安至少有48万常住人口。另外,“宿卫军11万,宦官0.5万,宫女3万,官、私奴婢11万,官户、工户、乐户等8万,僧尼4万,再加上流动人口3—4万,总计约90万人”^[11]。

第二,长安的粮食需求量。关中地区的粮食消耗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宿卫军队、官僚人员、皇室及相关服务人员、普通百姓。前三类人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但是要消耗绝大多数的粮食,并都由政府提供。

军队用粮主要是宿卫兵和战马的粮食消耗。11万宿卫兵,“人均每天耗米2升左右”^{[12]527},一个宿卫兵一年耗米约720升,即7.2石米,11万宿卫兵一年耗米约79.2万石。11万宿卫军中北衙军约3万人,南衙军约8万人。北衙兵是由飞骑演变而来,一兵一马,南衙兵则是“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4]1325},南衙军有马4.8万匹,共有马匹7.8万。“唐代一马粮料当三兵口粮”^[11],则一马一天需要米约6升,一年约21.6石,7.8万匹战马岁需粮168.48万石。一年宿卫兵马共用米约247.68万石。

从唐高宗起,官僚机构日益壮大,显庆二年(657年),“即日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约准三十年,则万三千余人略尽矣”^{[2]6308};总章二年(669年),“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2]6362}。唐玄宗开元年间,“京师文武官员二千六百二十人”^{[13]1106},官员的粮食消耗急剧

增加,“以地租春秋给京官,岁凡五十万一千五百余斛”^{[4]1395}。

皇室及相关服务人员宦官、宫女、奴婢、官户、工户、乐户等,大约23万人,一人一年耗米约7.2石,23万人一年共需米165.6万石。

除此之外,还剩约56万不需要政府直接提供粮食的普通百姓,一年约耗米403.2万石。综上,唐前期长安的粮食需求量每年达860余万石,政府的粮食需求量达到460余万石。

第三,长安的粮食产量。粮食产量可以通过课丁数乘人均田亩数乘亩产量进行计算。长安约有8万常住户,课丁数以每户一课丁计算;结合史料记载以及关中地狭人稠的实际情况,人均田亩数以60亩计算较为合适;欧阳华等学者得出“唐代粮食亩产二石左右”^[14]的结论,京师自身的粮食产量应该是960万石。“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4]1365}高宗以后粮食需求量增加,漕运的数量加大,可以平均每年100万石计,共有上千万石粮食。按照这个标准,京师在无任何灾害的理想状态下,勉强能够维持自身的生存。但唐朝前期是灾害的频发期,显然不可能实现无歉收,“移都就食”就显得尤为重要。

2. 关中地区环境恶化

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汉书》中记载:“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1]2849}由于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先秦时期就成为传统农业的发祥地。也正因如此,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很早就遭到了破坏。到唐代人口激增和土地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贞观年间就“地狭人稠,耕植不博”^{[5]2701},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扩大耕地面积,大面积的草场和森林被破坏,北边的草原不断向北退缩。高宗朝开始,官僚机构庞杂,统治阶级生活竞相奢靡,日常生活要消耗大量的木材,尤其是官员宅邸的营建,以长安城为例,城内宫殿完备,“仅大明宫、兴庆宫的修建就需要消耗森林25.5km²,而这两处宫殿群的面积仅占唐长安城总面积的5.5%。按照这个基数可推论得出,建设长安城至少需要消耗1530km²森林”^[15]。到“开元、天宝年间,关中地区已经找不到5—6丈

长的松木了”^[16]。地面植被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固化土壤、涵养水分、调节气候等多种作用。关中以及周围地区的植被系统被严重破坏,土地承载力处于过度饱和状态,使得河水的流量不稳定,水土流失日益加重,出现了严重的土地沙漠化、盐渍化面积扩大等问题,之前的美誉一去不复返。

3. 灌溉系统遭到破坏

唐代初期关中地区的灌溉系统也遭到了极大破坏。“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13]4563},仍以每亩产粮两石计算,就有890万石粮食,可谓是“沃野千里”,“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3]3262}。可是,自西汉到魏晋南北朝以来,经过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及统治,灌溉系统不仅长期得不到整修,还遭到了很大破坏。加之一些富商大贾在郑渠、白渠设置了许多碾碓(利用水力的石磨),引郑白渠之水到渭,使得渠水梗涩,灌溉田亩数减少。“圣唐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八九千顷。”^{[13]4563}这样大约减少粮食生产760万石。郑白渠是关中主要的灌溉系统,使得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更加困难。

4. 漕运花费巨大

高祖、太宗时期,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比较简单,一年漕运20万石米便够。高宗和玄宗时期,“国用渐广,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5]3081}。可漕运着实不易。“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留一月以上。至四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干浅,船艘隘闹,般载停滞,备极艰辛。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5]2114}

洛阳再运到长安才是运输的关键。“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而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

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而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陆之直,而河有三门砥柱之险。”^{[4]1365}洛阳到陕州仅300里,却要花费整个运输系统绝大部分的费用,远超过所运输粮食的价值,运进的粮食可谓是“一粒粮食一粒金”。

(二) 洛阳:天下粮仓、漕运之便

仓储系统是一个国家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国家安定与社会再生产、再分配的任务,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洛阳的仓储系统非常完善。有著名的“储粮千年而不腐”美称的“天下第一大仓”——含嘉仓,它既有太仓的功能,又有转运仓的功能,远远超过长安太仓的地位。1971年洛阳市发掘的含嘉仓遗址,实探粮窖259个。由出土铭砖可知一个粮窖可容纳上万石粮食。天宝八载(749年),含嘉仓储粮“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17]205}。除了含嘉仓,东都还有洛口仓、回洛仓、河阳仓等大仓,其规模也是相当大的。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贯通南北东西,是全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舟车之所会,流通江汴之漕,控引河淇之运,利俗阜财,于是乎在”^{[7]1354}。洛河贯穿洛阳城,城内河渠众多,以京杭大运河为依托,四通八达,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完善的储粮系统,加上其优越的地势条件,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漕运体系。隋开皇三年(583年),“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18]683}。隋炀帝时期,为了保证洛阳的漕粮供应,大业二年(606年)“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2]5626},再加上裴耀卿在通济渠口处修建的虎牢仓和东都的含嘉仓,使河渭漕运体系更加完善。唐高宗时期,在隋漕运基础上,又新置了柏崖仓和渭南仓,形成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粮仓转运系统,实现了全国性的长途运输,保证了东都粮食的有效供应。

(三) 直接原因:灾不空发

有关唐朝灾害的研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邓云特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唐代“享国二百八十九年,而受灾竟达四百

九十三次。计所患者,有旱灾一百二十五次;水灾一百十五次;风灾六十三次;地震五十二次;雹灾三十七次;蝗灾三十四次;霜雪二十七次;歉饥二十四次;疫灾十六次”^[19]¹⁸。唐前期是自然灾害频发期,另有学者统计“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达136次”^[20],唐前期就有47次。

关中有同一年发生多种灾害的情况,有连续几年灾害不断的情况。在众多灾害中,旱灾和水灾是多发灾害,影响巨大。旱灾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灾害,虽然过程比较温和,但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大。如永淳元年(682年)的旱灾,“以年饥,罢朝会。关内诸府兵,令于邓、绥等州就谷……上以谷贵,减扈从兵,士庶从者多殍踣于路”^[5]¹⁰⁹。而且旱灾往往还会引发蝗灾,由于其破坏性大,受灾人数甚众,常常导致疫病发生。永淳元年,高宗到东都不久,“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病,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瘞……京师人相食,寇盗纵横”^[5]¹¹⁰。这种并发性灾害在唐朝频繁发生。再如咸亨元年(670年),“天下四十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关中尤甚。诏令任往诸州逐食”^[5]⁹⁵。水灾通常是突发的,破坏性极强,永淳元年六月,“顿降大雨,沃若悬流,至是而泛滥冲突焉。西京平地水深四尺已上,麦一束止得一二升,米一斗二百二十文,布一端止得一百文。国中大饥,蒲、同等州没徙家口并逐粮,饥馁相仍,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5]¹³⁵²⁻¹³⁵³。

唐前期帝王“移都就食”于洛阳的直接原因是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歉收甚至绝产,而关中频繁的自然灾害,除自然原因外,也与长期以来关中地区的超负荷运转有极大关联。

三、唐代移都就食的几个其他相关问题

(一)移都就食的路途情况

唐前期帝王因就食等原因频频往来于长安和洛阳之间,两京的政治经济意义决定了其间交通路线的成熟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交通干线为崤函古道。崤函道不仅是河渭漕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食行动走的也正是这条道。

从长安到东都洛阳共835里,“急事二日余可达”^[21]。

就食行动是大规模的人口移动,有朝廷百官、宫廷女眷等,需要乘坐马车,自然不能走得太快,以每日30里计算,也得数旬。有学者统计,为了就食路上方便,隋唐时期在崤函古道上设置了16所行宫、21所驿馆,这也是唐代的第一大驿路。“这16所行宫分别为:轩游宫、上阳宫、桃源宫、陕城宫、绣岭宫、兰峰宫、沙册宫、崎岫宫、福昌宫、兰昌宫、连昌宫、兴泰宫、显仁宫、甘泉宫、连耀宫、紫桂宫。其中轩游宫、上阳宫、陕城宫、福昌宫、显仁宫这5所建于隋朝,剩余11所建于唐朝,并且高宗时最多。21所驿馆分别为:潼关驿、阆乡驿、盘豆驿、湖城驿、稠桑驿、桃林驿、荆山馆、柏仁驿、红亭、甘棠驿、硖石驿、嘉祥驿、鹿桥驿、三乡驿、福昌馆、柳泉驿、甘棠馆、三泉驿、芳桂宫驿、澠池南馆、新安驿。”^[21]这为大规模的就食行动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

(二)移都就食洛阳期间的政务处理

移都就食洛阳期间,主要的行政机构及权力中心在东都,一些重大政务和常规政务都需要在东都处理。

主要处理的重大政务有镇压边疆地区及内部的叛乱,接受外族朝献及受降、和亲,编订志、历、经等颁行天下,改革科举制度,置废粮仓,整顿钱币等。太宗、高宗和玄宗多次在就食东都期间处理外族叛乱的问题,如太宗在东都招募勇士亲征高丽;高宗伐突厥、百济、高丽、新罗等;玄宗讨契丹、渤海靺鞨族等。并且多次接受外族朝献,如高宗时“支汗郡王献碧玻璃”^[5]⁹⁹“龟兹王白素稽献银颇罗”^[5]¹⁰⁰“新罗遣使入朝献方物”^[5]¹⁰⁰;玄宗时“波斯国遣使献狮子”^[5]¹⁸⁴等。开元二十年(732年)五月,“信安王献奚、契丹之俘,上御应天门受之”^[5]¹⁹⁸。在编订历、志、经方面,太宗时期主要有《氏族志》,高宗时期有《麟德历》,玄宗时期有《开元新礼》《孝经》等,虽然开始编订时未必在东都,但正是就食东都期间成书并颁行天下。高宗时建河阳柏崖仓,开元十年(722年)九月废之。玄宗就食东都期间,还完成了与契丹族和亲、完善科举制度以及整顿钱币等事务。

主要处理的常规政务有封禅泰山、选举贤才、东都建造宫殿、封黜皇子及官员、救灾、赐宴、改官名地名、大赦诸州、检阅军队等。每位就食于东都的皇帝都会处理这些常规政务,尤其在选举人才方面,三位皇帝历次到东都都会下令举荐德才兼备之人,委以重任。

太宗、高宗及玄宗带领后妃和官员等就食于洛阳,短则几个月,长则数年,一些重大决策都出自洛阳,政治中心即在洛阳。

(三)非移都就食期间洛阳的管理体制

皇帝等人在洛阳就食渡过难关返还长安后,政治中心即在长安,东都实行留守制度。

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第一次就食于洛阳,改洛州为洛阳宫,洛阳的政治经济地位开始上升,虽以宫为名,却有都城之实。十二年(638年),太宗返还长安时,“唐兰谟为武侯大将军,令于洛阳宫留守”^{[7]3816},“刘童为御史,东都留台”^{[22]281},正式确立了东都留守制度。十七年(643年),“东都留守,以萧瑀为之”^{[23]1184};二十三年(649年),“叠州都督、英国公绩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仍于洛阳宫留守”^{[5]66},东都留守制成为一项政治制度。

“凡车驾在京,即东都南、北衙皆置左右屯营,别立使以充(统)之。若车驾在都,则京城亦如之。”^{[12]159}“若车驾巡幸在京,则都一人留守,以总卿贰之职;在都,则京亦如之。”^{[12]503}

自高宗开始,洛阳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高宗在位33年,其中有11年居住在洛阳,“修乾元殿……乾元殿成。其应天门先亦焚之,及是造成”^{[23]552},全面恢复高祖焚毁的洛阳宫城正殿、正门的規制。高宗称“两都是朕东西之宅也”^{[23]552},玄宗也称“京洛两都,是惟帝宅”^{[23]1575}。但是,在非移都就食洛阳期间,由于皇帝居住在长安,一些重要的政令都出自长安,政治中心便在长安。

(四)移都就食期间长安的管理

皇帝就食洛阳期间,长安的政治地位相较于洛阳居于次要地位,转为陪都。在此期间,长安实行皇太子监国制度,管理常规政务工作,并令近臣、重臣辅佐。如“太宗幸洛阳,太子监国,命摄少师”^{[4]3840};咸亨二年(671年)正月,“留皇太子弘于京监国,令侍臣戴至德、张文瓘、李敬玄等

辅之。唯以阎立本、郝处俊从”^{[5]95};显庆四年(659年)十月,“如东都,皇太子监国”^{[4]59};永淳元年四月,“幸东都。皇太子京师留守,命刘仁轨、裴炎、薛元超等辅之”^{[5]109},这就形成了移都就食期间太子监国这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但这项制度有时也有例外,如永淳二年(683年),“令唐昌郡王重福为京留守,刘仁轨副之。召皇太子至东都”^{[5]111}。当然,在就食洛阳期间,虽然保证了长安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但政治中心无疑是在东都。

(五)朝野民众对移都就食的看法

皇帝为了吃上饭,被迫带领大批人马离开京师,逐粮而居,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不可思议的事情。隋代从隋文帝算起,三次被迫于洛阳“乞讨”;到唐太宗、高宗、玄宗,十五次逐粮而居洛阳,成为名副其实的“逐粮天子”;再到隋炀帝和武则天为避免“乞讨”的尴尬,直接迁都洛阳。上到天子,下到普通民众,都知道这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资治通鉴》记载:“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说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乞有逐粮天子耶!’乃止。”^{[2]6639}没有人提即作罢,只要有人提醒,就得面对这份难堪,中宗恼羞成怒,不愿意继续做个“逐粮天子”,在长安硬撑着。德宗时期,关中粮食匮乏到禁军将要哗变,紧要关头运来三万斛米,德宗就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2]7469}可见,当吃饭难成为威胁其统治的重大问题时,根本顾不得颜面之事。著名诗人白居易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著作佐郎顾况看到他的名字后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24]302}看似玩笑,实则无奈。

唐代这十几次的移都就食正是发生在最鼎盛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期间,对于统治者来说,无疑是对其统治的一种否定,因而在一些正史中,关于移都就食的记载是很少的。从移都就食这件事本身来看,皇室带领诸亲、大臣们“风餐露宿、颠沛流离”,说的好听一些是“临时办公”,实际上就是到洛阳讨饭吃。因此包括

“逐粮天子”在内,朝野上下一致认为这是一件脸面难堪但却行之有效的办法^①。

注释

①参见丁海斌、王立强《谈中国历史上都城最典型的“主辅摇摆期”——隋唐都城长安(大兴)与洛阳主辅关系转换问题研究》,《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该文首次提出“主辅摇摆期”这一概念。同时,“移都”并非官方正式宣布都城的转移,而指实质上的政治中心。

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赵建勇.唐关中农业与长安粮食供应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
- [7]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8]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上海:三联书店,2001.
- [10]宋敏求.长安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 [11]徐宏件.论唐都长安的粮食供应[D].陕西师范大学,2007.
- [12]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3]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4]欧阳华,焦媚霞.唐代粮食亩产量辨析[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01(4):13-15.
- [15]崔玲,周若祁.唐长安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恶化关系研究[J].华中建筑,2009(3):166-171.
- [16]王颜.论唐代关中地区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5):81-87.
- [17]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8]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9]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 [20]靳强.唐代的自然灾害若干问题研究[D].武汉大学,2013.
- [21]李久昌.崤函古道交通线路的形成与变迁[J].丝绸之路,2009(6):7-21.
- [22]刘肃.大唐新语[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
- [23]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 [24]爱新觉罗·弘历.唐宋诗醇[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

A Study on the Phenomenon of Moving the Capital to Food in Tang Dynasty

Ding Haibin and Guo Tingting

Abstract: Moving the capital to food is a special case in the phenomenon of “main and auxiliary swing”. The phenomenon of shifting the capital to food in history is the most typical in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Tang Dynasty, there were at least more than ten shifts from Chang’an to Luoyang. Under the splendor of Chang’a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re were shortcomings hidden: the land bearing capacity was already over-saturated. Coupled with the severe natural disasters at that time,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Guanzhong area was greatly lowered, and food was far from being able to continu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apital of the capital. Moreover, the water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as not perfect. It was far more difficult to transport grain from the Jiangnan region to Chang’an than to Luoyang. Therefore, the emperor led his concubines and officials to the eastern capital for food. During the eclipse, the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center was also transferred from Chang’an to Luoyang. It was not until after Kaiyuan that the water transport problem was well resolved, and Luoyang City gradually declined, and the emperor and his party stopped going east to eat.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Tang Dynasty, eating food wa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emperor to go to the eastern capital. Therefore, eating food wa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studying the issue of the “main and auxiliary swing” period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ang Dynasty; Chang’an; Luoyang; main and auxiliary swing; moving the capital to food

[责任编辑/知 然]